

共产国际 与 中国革命

一九二四 —— 一九二七年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

[联邦德国] 郭恒钰著 李逵六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

〔联邦德国〕郭恒钰著 李逵六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王师颀

Kuo Heng-Ytt

DIE KOMINTERN UND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Die Einheitsfront zwischen der KP Chinas
und der Kuomintang 1924—1927

Paderborn Schöningh Verlag 1979

译自联邦德国舍宁出版社1979年德文版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GONGCHAN GUOJI YU ZHONGGUO GEMING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

〔联邦德国〕郭 恆 钰著

李 逵 六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5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75印张 273,000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800

书号 11002·643 定价 2.10元

内部发行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

廖盖隆

联邦德国学者郭恒钰先生^(注)的近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德文版于一九七九年由联邦德国帕德博恩的舍宁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曾引起联邦德国史学界的重视，被认为值得推荐的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的一本资料丰富的参考书。三联书店的编辑同志约请李逵六同志把它译成中文，并在这个中译稿发排之前要我先看看，并为这本书写一篇介绍性的文字。下面写的就是我对郭恒钰先生的这部著作的读后印象。

首先我要指出，郭恒钰先生根据他自己的教学心得和长期积累的资料所写成的这本书，用许多事实材料证明了共产国际在中国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即在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一味妥协迁就，和对武装斗争在中国的重要性缺乏认识；这本书还指出了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对资产阶

(注) 郭恒钰系德籍华人，哲学博士，现任柏林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兼柏林自由大学哲学暨社会科学院（第二分院）副院长。曾开设过三十年代中共党史课，讲授中共早期党史。他于一九八〇年来华访问，并应有关单位的邀请，介绍了国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些情况和问题。

Ant 4/40/18

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的正确性。这些就是本书的主要论点。我认为这些论点无疑是对的。这本书引用了当时中国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很多材料，这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同时我认为还要指出，这本书有一些具体问题以至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有判断错误和前后矛盾之处。

关于共产国际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问题上的错误。本书作者正确地指出，如何对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蒋介石的问题，本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如何对待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革命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犯了一味妥协迁就的错误。

作者指出，首先，蒋介石就是被鲍罗廷捧上最有力的领导地位的：“就在廖仲恺遇刺的当天（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决定组成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有政治、军事和警察的全权，鲍罗廷任顾问，也是他把蒋介石推上了这个最高、最有力的领导地位。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来说，这是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这是蒋介石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特别委员会组成四天以后，蒋介石被任命为广州卫戍司令，接着，八月二十六日粤军改组，称‘国民革命军’”。同年九月，许崇智、胡汉民被蒋介石迫令离开广州。“排除了胡汉民、许崇智，蒋介石就可以夺取党政军的绝对实力地位。”

其次，作者指出，在国民党右派举行西山会议造成了国

共可能分裂的严重局势以后，中共在上海的领导在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谈以后却采取同右派妥协的步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内举行会谈，一方是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另一方是孙科、叶楚伦和邵元冲。双方一致同意，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右派领袖回广州时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在代表大会上解决。”

不仅如此，在蒋介石发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件以后，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不仅一味对蒋介石妥协让步，而且一度撇开汪精卫，单独支持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整理党务案》是鲍罗廷从苏联返回广州后未经征求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同蒋介石商定的。作者说：“事态发展证明，共产国际继续支持蒋介石是一个原则性的、灾难性的错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件从另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是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要议题的，作者指出，不可原谅的是，这次全会“竟有意识地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件排除在外，也未能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再有，全会对中国革命在当时发展阶段的核心问题之一：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对待蒋介石、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这也是全会及其关于中国形势决议的主要错误。全会制定的策略对外称为‘在保持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开展农民运动’，事实上也就是保持同蒋介石的统一战线；但是事实进

程表明，正是这样一个策略加速了中国统一战线的破裂。”作者说：“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期犯下了多大的错误。”我们知道，从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特别会议以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中占了统治的地位。

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曾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三中全会却选举了当时还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尤其错误的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作者正确地指出，“在（保留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个问题上，以鲍罗廷为首的共产党人犯了致命的策略错误。”

蒋介石这时加快了同上海买办资产阶级、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同北方军阀的勾结，准备在攻占上海、南京以后就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在实行一场大屠杀。“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由南京到上海后就立即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说，他无意用武力改变上海国际租界的现状，他的军队负责维持平静和秩序，解除‘非法分子’的武装。”当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的时候，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在讲话中却说：“右派顺从我们……为什么要驱逐右派？……蒋介石……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能有其他作为。……要充分利用他们，就象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作者说：“但事态发展表明，不是工人阶级利用了右派，而是右派利用了工人阶级。‘被挤干的柠檬’——蒋介石

石在斯大林讲话后六天残酷地镇压了工人阶级，篡夺了政权。”

况且，斯大林、布哈林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并不是得不到中国形势危急的材料。当时共产国际驻在上海的三个工作人员N·纳索罗夫、N·费基内和A·阿尔布雷斯特在三月十七日的上海来信中就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蒋介石正在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情况。这三个作者说：“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长期以来‘没有留心’这一冲突，对此也没有表示过他们的意见。”据说鲍罗廷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人们几乎看不出中共中央的右倾集团、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同志之间在意见上有什么原则区别。这三个作者建议共产国际召回维经斯基，另派一个更重要更有能力的同志到中国来，他同时代表共产国际和领导鲍罗廷。

郭恒钰写道：“三位作者的分析虽然正确，但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中共领导中的右翼，特别归咎于鲍罗廷，未必不是错误。他们‘忘记了’，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斯大林坐在莫斯科。”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斯大林和布哈林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来为共产国际的错误策略辩解，硬说共产国际的策略一贯是正确的，同时坚持对汪精卫和唐生智（还有冯玉祥）采取同过去对蒋介石一样的策略。作者说：“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言论明显表明，他们害怕大胆进行土地革命，因为群众运动激烈左倾会危及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二七年五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决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同国民党保持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开展土地运动，“没收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实际上，那次会议

和同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一样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五月下旬已经盛传蒋介石与武汉和解，或者和冯玉祥合作。但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却出来辟谣。一九二七年“六月初《国际新闻通讯》第五十七期上有一篇题为《向北京进军》的文章说，‘这些全是谎言’，武汉政府和国民党把蒋介石看成革命最可恶的敌人，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同蒋介石还保持任何联系。……冯玉祥自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的行动后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叛徒了。”

作者写道：“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说，‘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但农民协会已经被军队打垮了。莫斯科的指示表明，共产国际的基本政策根本没有改变，这个指示要在国民党内部贯彻完全是幻想。一句话，五月指示暴露了，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是相距得多么遥远。”

作者写道：“‘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政客，都是用诺言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因此，工人应当使人民看清楚资产阶级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团结，本身的武装。’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远方来信》上写下的进行革命的艺术原则。共产国际不仅是忽视，甚至是践踏了列宁的话。”

作者在结论中说：“从（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继续采取同样的策略，因而酿成了上海事变的重演，而这次是动摇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和武汉将领的不流血的政变。”“共产国际没有从中国革命的重大失败中

吸取教训，因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又重复了同样的错误。”

作者说得对：“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经验和反对国民党的长期斗争的经验出发，没有轻易接受（共产国际的）这条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因为斯大林的这一条统一战线路线表明，共产国际并没有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得到应有的认识。”后来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秘诀在于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也就是‘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制定的统一战线策略，主要的依据就是对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的认识。”“可以说，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的实践，修正并继续发展了列宁的统一战线策略。”

关于共产国际对武装斗争在中国取得政权中的作用缺乏认识的问题。作者说，五卅运动的遭到镇压，证明了依靠罢工和群众运动来夺取中国民族革命政权的效力是有限的。L·格勒一九二五年九月在全面分析上海罢工以后指出：

“罢工的时间愈长，愈可以明显看出，民族革命的主要目标不可能通过罢工——即使不断地进行——来达到，而要通过中国人民的武装斗争，通过一场胜利的战斗才能达到。”作者接着说：“但是，格勒在一九二九年发表的重要言论不过是一种认识，以后一直没有作为（共产国际）基本任务之一而付诸实施。”

作者还引用了作为国民党的列席代表的邵力子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月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发言，邵力子说：他表示相信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我们坚决相

信，没有武装便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一点。”作者说：“这句话以后被斯大林所引用，后来又为毛泽东所接受。”作者引用斯大林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的一句话：“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然后评论说：“但是，人们从这个认识并没有得出实际的结论，只有毛泽东接受并发展了这个思想，它也是毛泽东主义（按：指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成分。”作者把武装斗争问题看作是夺取政权的方法问题。他在结论中说：“北伐期间，共产党，也如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所指出的那样，还没有彻底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换句话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上述内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丰富和痛苦的经验得到的认识，这个认识也为以后的历史所证实了。”

以上这些基本上正确的意见，以及它所引用的丰富的历史材料，我认为就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书的主导方面。

但是我也认为这本书的作者在以下的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或者是自相矛盾的。

（一）作者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人造的早产”，“在建党的代表中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共产国际的帮助诚然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就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这正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对中国人民的宝贵的援助。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的

话，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会稍许推迟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国际的推动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稍微提前一些了。但是作者反复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人为的早产”却是没有意义的，也是错误的。作者与此有关的一些论断也是不对的。

其实作者自己就说，至二十世纪初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增长。根据一九一九年的统计，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已有二百万人（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俄国产业工人也不过二百七十多万人）。作者还讲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它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得到正确的运用和发展，并迅速取得胜利，更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在驳斥艾奇逊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在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作者说：“共产主义，尽管同中国文化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并没有内在的亲缘关系，它是西方经过苏俄传到中国的。”

说马克思主义是经过苏俄传到中国这是对的，但是说共产主义仅仅是“同中国文化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就不对

了。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说得好：“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大多数的民族里还有黑帮和教权派的文化），而且这不是一些‘成分’，而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中国的文化发展史，就会知道，中国从古以来的文化中就有虽然是还不发达的，但是反映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的利益的生活条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从《礼运·大同篇》、《墨子·兼爱》到太平天国所幻想的“太平天国”，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孙中山的“中国的民粹主义”和“主观的社会主义”，就是显著的例证。当然，这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还不发达的”，除了孙中山的思想以外还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从《礼运·大同篇》到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还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的共产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从西方学来的，这就是“西学”或“新学”；科学的共产主义也是首先在西欧产生并且经过俄国人的介绍输入中国的。但中国历史上的这些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表面上，而且是从内容来说，也是趋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因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心也是相通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代表中间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唯一根据是《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到一九三八年才出版，这也是判断的错误。在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二一年，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等，都已经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相继转变成了共产主义者，这有他们的文章、通信和发言纪录可以证明。《资本论》的全译本诚然是一九三八年才出版的，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全译本是一九二〇年就出版了，还有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相继出版了，而且上举的李、陈、周、蔡是可以看外文的。

我在上面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也许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稍微推迟一些，这样说也是有根据的。据《李大钊传》载，一九二〇年春天，李大钊就和陈独秀等商量过建党问题；一九二〇年秋天，蔡和森给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就提议要建立共产党了。而旅欧中国革命学生在没有共产国际推动的条件下，也果然独自成立了中国少年共产党。由此可见，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是受到了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也确实是成熟了。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援助，最迟到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也会成立的。

(二) 作者主要是根据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孙中山的充满歪曲的叙述，而对于孙中山的历史作用作了错误的判断，把孙中山也说成是反共的。作者毫无根据地说：“孙中山把同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时期看作是平衡的战略阶段。”“孙中山对于平衡阶段可能出现分裂，进攻阶段不可避免地同共产党发生破裂是有准备的。”又说：“孙中山当然知道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阴谋活动（？——问号是引用者加的），但是不相信为数甚少的中国共产党员

有能力夺取国民党的领导。”作者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想就把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描写成同蒋介石一样的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政客，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广大人民却不是这样评价孙中山的。

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说得对：“孙中山纲领每一行都浸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的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有力量的。”“中国民粹主义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反动理论。”但是“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的反动经济理论（指防止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最有意思的是，列宁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要正确地对待孙

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遗嘱。他说：“最后，由于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内核。”

应该指出，郭恒钰先生是读过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这篇论文的，但是他从这篇论文中只引用了孙中山的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反动理论”这半句话，而又删去这句话之前的“从学理上说”这半句重要的限制性的话，尤其是丝毫不提孙中山“热烈同情被剥削群众”、“真挚地同情西方的社会主义”以及“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和客观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些极其重要的评价，这就完全歪曲了列宁上述论文的基本精神。

让我们再看看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所写的《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是怎样评价孙中山的吧。他在这篇论文中把孙中山称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说“他全心全意为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完全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指出孙中山在民主革命的准备时期就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指出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把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指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结论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人。”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

正在完成这个革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晚年的光辉革命业绩。他说：“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了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按：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而这个宣言是孙中山在遗嘱中所充分肯定的。关于这个宣言，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引用者注）。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谈到孙中山遗嘱中所总结的四十年经验同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的比较，毛泽东又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的‘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革命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